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比较城市化

〔美〕布赖恩·贝利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比较城市化

— 20世纪的不同道路

〔美〕布赖恩·贝利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城市化:20 世纪的不同道路/(美)贝利著;顾朝林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7262-5

I. 比… II. ①贝… ②顾… III. 城市化—对比研究—
世界 IV. F2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710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比较城市化

——20 世纪的不同道路

[美] 布赖恩·贝利 著

顾朝林 汪 侠 俞金国

赵玉宗 薛俊菲 张从果 译

彭 翀 杨兴柱 刘贤腾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262-5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 22.00 元

© Brian J. L. Berry 1973, 1981

COMPARATIVE URBANISATION

Divergent Path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Comparative Urbanisation*, 2nd edition by B. Berry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04 年已先后分十辑印行名著 400 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一辑。到 2010 年底出版至 46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 年 10 月

译者前言

城市化曾经是 20 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过程，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一直在关注城市化研究。本书是布赖恩·贝利(Brian J. L. Berry)的代表作。也是西方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前城市化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本书通过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的比较研究，认识到在 20 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城市化的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化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产生了多样化的人类后果。本书首先分析了 19 世纪工业城市化的特征，讨论 19 世纪发生在城市中的社会转型所引起的人口和社会运动，并指出城市规划的出现是作为对城市负面影响的一种反馈。其次，对北美、第三世界国家、欧洲城市化的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关于北美城市化动力机制和人文结果，从规模、相互作用密度和内部差异三个方面来进行解释。贝利认为伴随着美国出现的马赛克文化，美国的规划方式也趋于支持私有化和马赛克文化，而不是提高规划客体的生产性。关于第三世界城市化的道路，作者认为不同于西方。在乡村向城市社会转型中，人口主要迁移到大城市的外围聚落地带；在城市经济对劳动力进行吸纳时，会产生空间扩散、阶级冲突以及次文化马赛克等问题；第三世界政

府以西方的理念为基础进行了城市化的速度、规模和方向的控制，但其政策很少具有预见性的结果。关于欧洲城市化的道路，不同于 19 世纪西方工业城市化，也不同于北美和 20 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经历的城市化过程。在欧洲的不同国家，差异化的形成缘于技术变革、国家意识形态、规划公权力的交互作用，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相应的多样化后果。第三，对 20 世纪 70 年代的城市化过程进行诠释。认为北美的城市化过程，既是技术进步驱动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驱动的结果。在以经济驱动为主体的情形下，以一种反馈和保守的方式对公众的利益进行表达，以解决出现的问题。第三世界城市化的过程不同于北美城市化过程，主要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技术影响，尤其是追求最大利润的驱动机制不同，包括竞争机制、公众利益表达等。欧洲的城市变化主要表现在公众利益的变化、公私关系变化以及城市化形式等方面，欧洲有着控制城市变化的多种有效方法。最后，本书还结合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状况，发现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形态和过程的差异化在进一步扩大。美国经历了加速分化和强有力的“逆城市化”现象。西欧和其他新市场经济国家，则把更多的平衡力转移到城市的离心化和分散化。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人口一直集聚在大城市，另一方面西方并不存在的很多城市化问题出现在第三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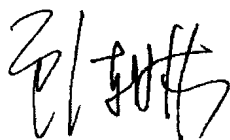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再一次推动和调整了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也使城市化的研究进入新时期并衍生出许多新方向。相关研究发现，世界上主要城市的快速发展与两个全球过程相关，第一个是经济全球化，第二个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

长。世界城市化趋势表明大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发展迅速。世界经济增长与大城市发展相辅相成,全球化正在重塑全球城市体系,使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城市增长迅速,而远离全球化过程的城市普遍处于衰退。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已被公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两大驱动因素之一。国际上一流的研究机构(如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国际系统研究所、福特基金会、梅林基金会、日本振兴会等)和顶级专家(如约翰·弗里德曼和约翰·罗甘等)都纷纷将目光转向中国城市化研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曾于“十五”期间积极推进实施城市化战略;最近国家实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也将“城市发展与城镇化”列为第 11 专题。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也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进器。

然而,一方面,由于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国外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城市化理论难以直接引进并加以应用,国内原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发展理论也难以适应新的发展,所以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一系列科学问题;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背景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高潮时期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态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拉动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城乡迁移、跨区流动,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无与伦比;此外,全球化、信息化也在对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施加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学者创立的城市化理论,无论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理

论,还是第三世界城市化理论,其理论框架虽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城市化研究的现实,但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研究理论框架是非常有科学意义和价值的。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Li Rui' (李锐),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07 年 4 月于清华大学

献 给 简

致 谢

拙作出版,得益于多位专家、学者的宝贵建议及帮助,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他们是:珍妮特·阿布-卢格哈德(Janet Abu-Lughod)、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McC. Adams)、威廉·阿隆索(William Alonso)、道格拉斯·卡鲁索(Douglas Caruso)、迈克尔·迪尔(Michael Dear)、罗杰·唐斯(Roger Downs)、艾利森·邓汉姆(Allison Dunham)、约翰·迪克曼(John Dyckman)、丹尼斯·费尔(Dennis Fair)、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Fischer)、杰克·费希尔(Jack Fisher)、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彼得·戈欣(Peter Goheen)、史蒂文·戈朗(Steven Golant)、彼得·古尔德(Peter Gould)、斯科特·格里尔(Scott Greer)、彼得·霍尔(Peter Hall)、尼尔斯·汉森(Niles Hansen)、昌西·哈里斯(Chauncy Harris)、桃瑞丝·霍利布(Doris Holleb)、约翰·卡莎德(John Kasarda)、罗伯特·莱克(Robert Lake)、纳撒尼尔·李斯维可(Nathaniel Lithwick)、艾金·马布高基(Akin Mabogunge)、哈罗德·麦金尼(Harold McKinnery)、杰克·梅尔策(Jack Meltzer)、威廉·迈纳(William

Miner)、德里克·莫分(Derick Mirfin)、曼宁·纳什(Manning Nash)、约翰·奥斯曼(John Osman)、费伦茨·普罗巴尔德(Ference Probal)、约翰·塞利(John Seley)、阿里·沙哈尔(Arie Shachar)、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霍华德·斯波德克(Howard Spodek)、杰拉尔德·萨特利斯(Gerald Suttles)、哈里·斯温(Harry Swain)、克里斯多佛·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彼得·泰森(Peter Tyson)、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尤林·沃伯特(Julian Wolpert)、马歇尔·沃登(Marshall Worden)、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还要感谢为专著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士:道格拉斯·卡格(Douglas Cargo)花费很多时间处理文中插图;昆廷·吉拉德(Quentin Gillard)、玛丽·格瑞尔(Mary Grear)在编排目录、打印手稿过程中付出很多辛苦,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夫人珍妮特(Janet),她的无私帮助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旅行、撰写和修改此书。没有珍妮特,本项研究工作是很难完成的。

贝利

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

1973.1

也要感谢为本书第一版提出建议性批评意见,以及与本书观点相左的人。第二版更正了第一版的错误之处,补缺了遗漏,并新增了 1970 年以后的一些内容作为新的一章,同时消除了出现在第一版中的争议。

贝利

马萨诸塞州西阿克顿

1981.2

前 言

由于杰出的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马奇(John Madge)的过早去世,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盛情邀请我填补他的系列出版物的空白。缘于学识浅薄我勉强接受。指定的书名为《城市化的人类后果》(近6万字),将其作为“20世纪的变革丛书”的一本。尽管早年接受过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专业学习,也从事过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渴望参与城市与区域规划,但是这对于一位早期从事计量地理研究的学者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开展工作初期,过去的学习和研究经历给了我一个好的开端,没想到我能按照计划时间完成,也没意识到,就是这段经历,国家政策和社会变化会最终成为我的研究方向,这也给我重新审视初稿的一次机会。

近年来,我作为专业地理学家、城市化教授和规划咨询专家,有幸能够访问全世界以及许多世界性的城市(除了中国和北非)。在这些旅程中,我也有幸与决策者、城市与区域分析师和规划师一起工作,也有机会看到和感悟到当今世界的城市状态。

在这些旅行中,有一件事情似乎变得很清晰。这就是我不应该再写通常运用数学方法的非常技术、比较狭窄的专业论文,而是明显感受到有责任从全世界的角度就20世纪的城市化及人类后

果发表实在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看法。这样的需求主要是因为我看到全世界的规划师,在一种特别常规的知识(conventional wisdom)理论框架下,为了产生“均衡的”城市化,为了创造更为人道的城市环境,都试图去阻止大城市的增长。而现实世界是,许多城市的规划并没有编制或实施,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向我们发出紧急的警报。

在我旅行时,我发现许多城市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自“19世纪工业城市化”这一章中的社会理论。因此,我开始认识到正在经历的很多问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常规的知识不再奏效。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对世界不同部分的比较,使我深信,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可以肯定不会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路径,各自的成因及相应后果不同。现在许多实用型城市学家也开始认识到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应付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城市化过程研究。

因此,在本书中,我所做的是不承认这样的观点:城市化有一个通用的过程,是一种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化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具有相同的事件发生顺序,城市化也能够产生积极的集聚形式。我不会关注由于现代化和工业化影响下的潜在的技术主义作用,去描述几个特殊的过程,而是试图获得一种认识。我强烈感受到:不仅要讨论在不同文化和时段已经产生差异的几个基本的不同过程,而且还要讨论这些过程在世界不同地方所导致的不同响应结果,这些会超越肤浅的相似性的描述。

如果能够从单一过程理论中获悉常规的知识,那么对所承担的一项分析写一篇典型的、学术性强的报告本应该是件容易的事

情,但这样做既是一种学术上的不诚实,也是对我所见到的全世界的需求的一种不负责任。我选择了一条更为困难的路径,对很多事实加以提炼,以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去诠释其特征,这样做既是对专家的一次挑战,同时也期望告知普通读者一个事实。

xii 第一章运用社会理论的常规知识对 19 世纪的工业城市化进行评判。对 19 世纪工业城市化的本质的审视为先后出现的几本重要著作提供了背景。这些著作描写了城市的社会转型、人口社会运动以及城市规划对城市健康和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

第二章深入分析北美城市化的经历。首先对北美进行详细的讨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很明显它是最熟的典型案例区,因此,毫无疑问可以通过它构建后几章运用的理论;但更为重要的是,北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还不太被世界其他地方所了解,这些地方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态势:把美国城市在 20 世纪中叶所具有的形象作为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应该成为或者可能成为的一个理想画面(或者说幽灵)。但是很明显,事实已经不再如此。在北美,很多关于城市化的人类后果的传统社会理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家们所创立的。北美城市化过程被快速的经济和技术变化所主宰,相对没有受到公共干预的束缚,有理由为其他地方的城市决策者们提供借鉴。不过这些变化首先产生了一种新城市形式,即汽车时代的离心化大都市结构。其次,在最近,出现了又一种完全新型的城市区域,这些区域从属于互相依赖的国家网络以及强化的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新的环境下,有学者对传统的社会理论去进行验证或者持质疑态度,甚至有人对城市化和城市能否作为相关的类别加以分析感到怀疑。

在第二章中,我试图构建另一种理论基础,运用于当今新形势下的美国。

第三章主要讨论第三世界国家。通常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扩散作用和城市化的发生,第三世界会经历类似于西方 19 世纪的历程。本章在于探究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基础不同,城市增长速度更快,在城市增长和社会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其结果是新的城市形式和崭新的社会环境出现。然而,在第三世界,接受西方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利用 19 世纪城市化的模式提出解决办法,要么与其一致,要么反对这种模式。无论采用其中的哪一种,他们的政策很少具有预见性的结果。

xiii

第四章讨论欧洲的几个城市,其经历不同于 19 世纪西方工业城市化,也不同于北美和 20 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在欧洲的不同国家里,差异形成缘于技术变革、国家意识形态、规划权力的交互作用。总之,这种交互作用产生了显著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城市化过程以及多样化的人类后果。

第四章才论及欧洲是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无论现成的理论还是常规的知识,都无法诠释当今世界的几个进程,尤其那些探索性的、微妙的、例外性的进程,无法去利用社会变化以达到明确的目标。当目标与反对 19 世纪工业城市化产生的人类后果的反应不符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因而,本书尝试结合这些新的社会变量去构建新的理论实体,欧洲的经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结合欧洲的经历,第五章试图去诠释 20 世纪 70 年代的城市化过程。就公众规划形式而言,假定它们的社会、政治环境特征不